

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研究的重大使命：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和叙事体系

任 平

内容提要 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研究的重大使命在于深刻揭示和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出场的必然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从实践创新到理论创新,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和叙事体系:①阐明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式现代化弊端的“道路之新”和“本质之新”;②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以基本经济制度和人文经济学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强大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③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如何面对现实的差异性社会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④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如何通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系统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⑤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涵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文明贯通;⑥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两山”理论;⑦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文明观。

关键词 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话语 中国叙事体系

任 平,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江苏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250326.003

当前,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研究的重大使命,就是以高度的哲学自觉进一步深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与本质要求,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其话语主题和关键环节在于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有效构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话语、中国叙事体系。然而,这一话语体系的构建决不能不看对象、没有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和趋势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19ZDA026)的阶段性成果。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5—46页。

针对性、不讲效能地“自说自话”，“生产什么就吆喝什么”，而是要聚焦于破西方话语霸权，立中国话语体系，以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创新话语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出场的必然性，深刻揭示和科学表达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创造“本质之新”的一系列表征。为此，我们既要知己，也要知彼，既要“读懂”西方又要“读懂”中国，精准剖析西方式现代化的固有弊端和核心思想，做到一击必中。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也决不能停留在表层叙事和经验表达层面，因为道路之争的关键是核心思想对话，这必然触及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的哲学对话。西方式现代化自启蒙以来就产生了现代哲学思想，在数百年演化中形成了最坚硬的思想内核。不打破这一坚硬内核，就无法破除西方话语霸权。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风格鲜明的哲学自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谱写了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1]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观点和根本看法，因而是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的理论前提，具有统领地位和决定作用。而揭示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唯物史观构成新世界观的核心。唯物史观聚焦于一个国家，就是要揭示这一国家的发展规律，成为指引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科学逻辑与价值指归。如果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理论的唯物史观中国逻辑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以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过程规律的科学理论引导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大目标，那么，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科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道路之新”以引领全体中国人民达成强起来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与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呈现为时代与哲学相互映照、对应表达的共进线。如果说，反思批判资本现代化是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前提，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就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推动唯物史观中国逻辑走向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理论指引和哲学表达。只有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现实出发，我们才能理解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真谛；而只有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才能真正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的哲学意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蕴着鲜明的哲学自觉，而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深深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自觉。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不仅体现为从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排、重大原则等战略实践方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而且体现为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对西方现代化道路所遵循的核心思想与哲学理念的超越，是对涉及现代化道路选择的“马克思之问”“列宁之问”的中国解答。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以哲学自觉展开关于现代化的核心思想对话。话语体系之间碰撞的涉及面是广泛的，关键是要找准各个领域对话的着力点，把握其核心思想的对话与撞击。只有在关于现代化的哲学对话地图上精确标记对话双方的核心思想，精准勾勒双方对话和撞击的态势，才能帮助我们深刻领悟、准确理解和总体把握对话前沿状况。这一研究总体勾勒前沿状况，具有高度的学术性和体系性，也是引导我们步入各个领域不断深化研究和阐释核心思想的学术路线图。限于篇幅，我们只能撮其大要，精准标记对话中关键的核心思想，其核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要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式现代化弊端的“道路之新”和“本质之新”，进而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原则高度揭示以中国方式解答世界现代化系列困境的必然性；二是要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以基本经济制度和人文经济学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强大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从而解决西方“资本盛宴”扭曲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发展方向所必然导致的危机；

[1]《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三是要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中国式现代化如何面对现实的差异性社会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从而超越西方式现代化带来的劳资对立、人与人全面异化和整体危机;四是要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观,中国式现代化如何通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关系统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破除西方式现代化的民主弊端,摆脱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民主困境;五是要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观,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涵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实现文明贯通(包含文明的连续性、主体性、一贯性和整体性),破除西方式现代化理论中的“传统-现代”二元分裂论;六是要科学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两山”理论解决西方式现代化带来的人与自然对抗难题,既超越西方式经典现代性“人类中心主义”,也超越后现代“生态中心主义”的偏狭话语;七是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文明观,以新全球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取代旧全球化文明,以“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超越中,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蕴含着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民主观、文明观和生态观,而且基于科学表达历史规律并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创造了一系列新概念、新思想、新论断、新话语,以中国方案解答“马克思之问”“列宁之问”,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篇章。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之新”与“本质之新”:出场逻辑

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研究的第一重大使命,就是以大历史观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之新”和“本质之新”,即其出场逻辑,破除在现代化历史迷思中的西方话语霸权,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在世界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具有历史原因和现实基础。西方现代化曾经造就一统天下的世界现代化格局,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超强实力维护全球霸权,并且用“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维护西方话语霸权。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性和欧洲新现代性的不同阶段,在创造了一系列值得人们汲取借鉴的共同经验的同时,受到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一贯奉行“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必然导致四大崩溃。一是资本盛宴阻碍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发展;二是资本逻辑造成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异化、冲突和对抗,进而导致社会崩溃;三是资本逐利冲动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异化、冲突和对抗,导致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崩溃;四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张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搞得世界不得安宁,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崩溃。上述四大崩溃,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具有必然性。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涉及四个方面的主张:一是以基本经济制度和人文经济学激发活力,促进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从而解决西方技术与生产力发展危机;二是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解决社会危机;三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解决生态危机;四是以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解决全球治理体系和文明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力图以此扭转四大崩溃的趋势,从而实现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特色的成功实践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实践的垄断,宣告了西方单线式历史观在实践上的破产。当前,实践上的成功要转化为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成功,就必须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展开多元现代化叙事,从而全方位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中国式现代化在超越资本逻辑宰制的西方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以自己的方式解答了“马克思之问”“列宁之问”。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辩证剖析了作为经典现代性样本的资本现代化的西方逻辑。一方面,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中从历史角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发展、人口集聚、社会变革、世界交往等现代性文明演进过程中具有的伟大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高度深刻揭示了资本异化劳动的本质性矛

盾及资本主义现代性必然退场的历史结局。马克思憧憬未来出现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认为,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会依次出场。在历史本质上是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指导下,关于社会形态的更迭和社会基本矛盾的运行机理以及生产力决定性地位和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理论是世界历史中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理论,其中,社会形态及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是解释人类社会总体运行的“历史图式”。但是,各个民族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特别是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就与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形态演化的总体进程并不完全一致,为此,马克思坚决反对将唯物史观当作“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更反对将仅限于“西欧的结论”即“唯物史观的西欧逻辑”不加分析地简单套用于一切民族国家,特别是东方国家,使唯物史观成为“单线道路论”,而是要将其当作理解和研究具体民族国家历史进程“方便的思维工具”,以“历史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重新考察,从中揭示民族国家的发展规律,呈现“唯物史观的民族逻辑”。唯物史观与民族逻辑的关系,不仅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总体与分有”的关系,而且是马克思《资本论》强调的“抽象如何上升为具体”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作为改变世界的“行动指南”,创立唯物史观的宗旨在于回到实践的具体实际从而有效指导实践。因此,仅仅抽象谈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而不指明民族国家的具体道路,不实事求是地指导实践,就毫无意义。揭示东方国家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的具体进程,构成“唯物史观的东方逻辑”。这一“唯物史观的东方逻辑”何以可能?这就是在现代性和社会形态变革问题上的“马克思之问”。同样,“列宁之问”也关乎“唯物史观的东方逻辑”。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在实践上开辟了第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打破了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式现代化的垄断格局。问题在于,列宁主义作为一种打破全球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成功开辟后发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其受到关注的地方主要在于其着力创造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而对于“唯物史观的东方逻辑”的本质性向度的关注却很缺乏。如果不从后发国家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这一根本场域出发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东方逻辑”,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丰富历程,不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核心就是从中国实际场域出发,实事求是地揭示中国道路的规律,形成“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就是全面、深入、真实地展示和说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规律的理论,在充分阐释和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实践的同时升华为哲学自觉,原创地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二、新质经济体制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现代性经济动能

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研究的第二个使命,就是要充分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这是以中国方案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关于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理论的重要着力点。破除西方式经济现代化弊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新动能的主要方式,就是以新质经济体制的实践和理论(包括基本经济制度、人文经济学等)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西方式现代化伟大的文明作用之一,就是以资本逐利性驱动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激发科技创新。然而,受到资本逻辑宰制,西方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革命,存在着方向上和根本上违背大众需要、仅仅为资本牟利服务的倾向,进而必然成为“资本创新逻辑”的工具,最终会导致一轮又一轮周期性的危机。资本逻辑倾向于以腐朽性、垂死性垄断阻碍科技创新和生产力变革,以“黑科技”绑架大众,造成大规模的严重的社会危害。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道路的主要内容之一。工业化一直是经典现代性的主要标志和主要内容之一。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则是后工业文明的主要标志。在当代,在经典现代性、后现代和新现代共存的复杂现代性世界语境中,中国要完成工业化,必须突破西方所谓“产业梯度递进规律”所主张的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经典现代性道路教条;抢抓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重大机遇,但是绝不走西方后现代的“产业空洞化”之路,而是走以先进生产力带动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走“工业制造2025”“互联网+”的道路。

“新质生产力”是新型工业化的中国话语,提出“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超越西方“梯度跃升”模式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有先进物质技术的支撑。”“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所谓“新质生产力”,是指由创新起主导作用,突破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21世纪新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效能,创造、发展不同于传统产业质态的新工具、新材料、新装备、新链条、新劳动要素组合的先进生产力。这一定义强调新质生产力由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反映了21世纪全球新科技革命带动产业革命的规律性要求,成为最前沿的新思想新概念,其“新”在于摆脱西方式资本逻辑宰制,选择新方向,展现中国主张。为此,基本经济制度和人文经济学,就成为引领和主导新质生产力的现代性杠杆。

新型市场化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关于资源配置方式探索的重大创新。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的最高表现,源自西方资本经典现代性。但是西方的资源配置和经济治理方式经历若干阶段,在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压迫下,“市场失灵”呼唤经济制度的重新设计,这离不开市场经济的自我革命和外部革命的共同协作。在西方,宏观经济从自由放任发展为市场-政府-社会三元综合治理,形成经济的“西教条”。苏联则教条化地用单一计划经济配置资源,形成“东教条”。为了总体破除“西教条”和“东教条”带来的经济现代化的弊端,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必然主张建立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主要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勾画和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上层建筑和政府职能都必须牢牢把握这一经济基础。可以说,这一混合经济既保留着经济的活力,又保障着经济为民的主体方向,因而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时显现比其他经济治理方式更多的优越性。激发新质生产力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依然要发挥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引领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人文逻辑,其要义集中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要在本质上打破西方式现代化囿于资本逻辑而崇尚“物的现代化”的历史迷思,走向“人的现代化”新目标,就必然要摆脱在本质上反映和表达西方式现代化诉求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霸权,解决西方主流经济学从资本逻辑发端的“理性人假设”导致的“人文缺失”和“人文悖论”问题,创造“人文回归”即以人文为本位的人文经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性人假设”造成的“人文悖论”的超越。人文经济学主张以人民为中心,强调经济要有人文关怀,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为人民共享,文化与经济要素共融发展、相互转化。在经历资源要素、资本要

[1][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8页,第28页。

素和科技要素主导期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化必然经历人文要素主导期。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化规律。因此,人文经济学将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文新目标、人文新动能、人文新赛道、人文新规则、人文新样态,全程引领和主导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经济特色。

三、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差异性社会的中国主张

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研究的第三个使命,是要科学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这是创新和发展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路径。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共同体话语和叙事体系,有三个关键词:差异性社会、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

“市民社会”是西方现代化指称社会成员组织状态的主要话语。从古希腊城邦国家用来指称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人构成的政治性社会组织的“公民社会”到欧洲十七、十八世纪以来商业社会中的独立的利益主体之间由普遍的商品交换关系和市场机制为纽带构成的城市中的“市民社会”,再到当代与市场经济脱离的完全由个人自愿交往构成的“民间社会”,市民社会都意指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的一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广阔领域,它由相对独立的各种组织和团体构成,是国家权力体制外自发形成的一种自治社会,是衡量一个社会组织化、制度化水平的基本标志,具有独立性、制度性的特点。自马克斯·韦伯以来,西方社会学总是以市民社会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动员状况、交往和组织化状况等作为社会现代化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以这一概念作为自己历史观的主要标识。众所周知,马克思正是以政治经济学反思和批判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颠倒,才走向将颠倒的关系再颠倒的建构唯物史观之路。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的多重含义涉及两个关键的方面:作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1]的“经济基础”方面和“资产阶级社会”方面。前者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强调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构成决定上层建筑的关键要件;后者涉及“资产阶级社会”这一特殊的指称。因此,不加分析地跨界平移,用之剪裁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状况,就容易导致误解。为此,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社会类型出发,坚持以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物质利益状况为尺度重新思考和提炼我们的社会概念,就变得十分必要和关键。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中国话语将成为我们由此生发的一切理论的共同事实基础。

与人类历史上的阶级对抗性社会、个人利益完全等同的同质性社会相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属于差异性社会。这一社会类型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治制度保障下,由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方式决定,人民在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全局利益、长远利益上趋于一致,具有共同利益基础,这种差异性社会与阶级对抗社会完全不同,有质的区别;同时,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状等造成人们在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阶级阶层利益上存在大量的非对抗性差异,即便民企、外企中存在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矛盾,其也在中国政党、政府和法律的强有力规制下被作为常规非对抗性矛盾处理,因此,这种差异性社会又与同质性社会相区别。“差异性社会”这一概念有助于准确判定中国社会的类型,以中国话语解读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矛盾主要处理方式和追求的现代化目标,不落入西方现代化的市民社会话语的窠臼。

从差异性社会类型的现实出发,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美好未来,就是要承认利益差异的现实合理性,在通过发展生产力做大蛋糕的同时公平地分配蛋糕,并且创造一切条件逐步缩小乃至消灭差异。这就是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缩小并最终消灭差异、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理想,但是这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我们不仅要反对主张在现阶段消灭一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切差异的空想社会主义,更要反对固化一切差异的新自由主义。我们要以“差异的正义”价值原则严格控制两极分化趋势,推动完善“基本公平+比例公平”的结构化公平正义模式,创造条件最终消灭差异,实现大同社会理想。

差异性社会中的利益差异诉求肯定会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现代化领域的话语呈现,涉及各种复杂的利益矛盾、社会矛盾。因此,在以人为本的公平发展、共同发展、协调发展的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建构和谐社会尤为重要。只有在差异性社会中,人们才需要并有可能建构和谐社会。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精神的当代实践。差异性社会、共同富裕、和谐社会,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社会现代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展现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社会形象。

四、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国特色民主政治

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研究的第四个使命是科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观,这是创新发展唯物史观的政治上层建筑理论的重要主题。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特色,在建制上和本质上充分反映了全体人民的政治愿望,着力破除西方式现代化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弊端,以中国探索为后发国家走民主政治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方案。

西方式现代化往往标榜西方式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并以此为标准裁剪和贬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然而,西方式民主政治不仅具有“政府失灵”性和内在冲突性,而且存在三大根本性的弊端:一是政治被资本金钱操控,人民成为工具;二是其民主为一次性选举民主,形式民主代替了实质民主;三是政党因利而内斗,导致国家分裂。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要打破西方式现代化的话语霸权,破除其诸种弊端,真正实现唯物史观强调的人民至上的价值诉求,就必须坚决破除西方式现代化中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具有唯一正当性、合理性、正确性的错误理念,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中政治现代化的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

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政治道路探索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民主政治提供了中国思想、中国方案。后发现代化国家大多在现代化道路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在执政党领导的国家政府主导下完成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目标;二是在前阶段的基础上,探索民主政治现代化道路。相对于英、法、美等先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德国、日本以及苏东、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许多后发国家成为第一阶段的佼佼者,但是在第二阶段陷入困境,几经挫折乃至停滞不前。因此,后发国家民主政治现代化的教训多于经验,困难大于成就。世界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在党领导中国人民为现代化奋斗的百年征程中,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经受了历史检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表明:只有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进而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之“能”源于现实奋斗的客观逻辑。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和全面领导下并由国家主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之“能”还是全社会利益分布和代表权的指向性决定的:在差异性社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景,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辉煌未来。

依法治国既表达了世界现代化的共同主张,又有中国特色。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将法治全过程纳入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将人民民主推进为国家权力的最高表达,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

代化的本质要求。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人民至上的唯物史观理论自觉的政治表达,在新时代丰富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内涵。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也就没有话语权。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比较优势表现在其对西方式民主政治的三个弊端的破除:用全过程人民民主代替西方式一次性选举民主;用致力于团结协商的民主代替西方式民主政党之间的为利而异;用全社会的民主代替少数人的民主。这一民主政治道路的发展与完善,将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五、中华文化现代建构:从传统走向现代

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研究的第五个使命就是全面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观。文化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关注的重大话题。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话语建构,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回答了宣传文化工作的一系列重大课题,以大历史观科学总结世界文明史、中国文明史、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变迁史、中国革命红色文化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发展史的规律以及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九个坚持”“四个强调”“两个结合”“七个着力”等原则性理论观点,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丰富了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文化成果。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文明的理论建构和特色话语表达的任务是多方面、多维度的。其中一个重大课题是,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在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总体规律的进程中要着力把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构的历史进程。为此,要全力破除西方话语霸权在文化现代化的理论话语上的种种谬误。

西方式现代化在文化、文明的理解上为了标榜自己的现代性品格,存在着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倾向,认为传统等于落后、愚昧、僵化,现代等于进步、文明、发展,传统一定阻碍现代,现代一定要否定传统。这一文化现代性的观点片面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忘记了两者存在的重要关联性。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文明观必须打破西方式文化话语的僵化霸权,主张“传统”与“现代”不仅存在差异、对立,而且存在连续性、主体性、一贯性和整体性。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有效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时期的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以历史辩证法把握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关系,重新构造文化现代化的中国话语。

所谓“连续性”,指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包含宇宙观、天下观、人生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等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成为我们构建现代化中国叙事体系的精神内核。所谓“主体性”,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当代之际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构的智慧内核,不是外来文化“裁剪拼贴”的结果,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主体自我运动、自我发展、自我创造的结果。所谓“一贯性”,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具有当代价值,不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而且对解决人类问题有重要价值。所谓“整体性”,指中华文明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精神宝库,我们要着力提炼和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说明中国文化追求的整体性问题、整体性解答和整体性成果对于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从而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活力,弘扬中华文明代表性的文化精神。

中华文化的现代建构需要聚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这一结合需要深度探索“为何结合”“何能结合”“何谓结合”“怎样结合”四个关键问题,提出关于“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解答,穿

透“相互契合”“相互成就”“共同发展”的话语,从而抵达更深层次的思考^[1]。这一解答的理论创新将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为中华文化现代建构的思想引领。

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山”理论的世界意义

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研究的第六个使命,即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阐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世界后现代或新现代性的思想内容。然而,林林总总的西方环境保护观、生态文明观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种种偏颇。在生态领域,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创造自己的理论话语,推进具有独立精神的自我实践,开创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理论和道路,打破西方生态文明话语霸权,破除其带来的种种弊端。

西方生态文明观的偏颇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逻辑基于经典现代性立场的逐利主张导致人与自然的全盘对立和全面异化。几百年来,由于资本牟利的需要,西方产业基于“人驾驭自然”“人类中心主义”等观念无限制榨取自然资源,破坏全球环境,这遭到世界生态理论主张者的痛斥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逻辑造成的这一现象已经作了深刻的批判。然而,全球环境仍面临重大危机,地球自然条件已遭到难以修复的破坏。而且,尽管全球社会对这一现象已经难以容忍,但是西方国家在资本牟利与环境保护发生尖锐冲突之时,往往选择破坏环境。日本的福岛核电站不顾全球环境被破坏、人类健康受损的恶果而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就是鲜明一例。二是后现代“生态中心主义”鼓吹“绿色资本主义”,主张在全球大力投资开发绿色产业。然而,“生态中心主义”主张在根本上排斥人民群众的利益主体地位,因而与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地位格格不入。事实上,“绿色资本主义”不主张放弃资本主义组织制度,只强调生态技术革命而不主张生态制度和生态组织革命,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的。

中国式现代化既超越人与自然对立的经典现代性,又超越排斥大众的“生态中心主义”的后现代立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现代性立场,主张生态为民、生态富民,将“两山”理论贯彻到底。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成为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的生态主张。

七、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世界变局的文明走向

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研究的第七个使命,即谱写全球文明观新篇章。中国式现代化加速发展的全球效应就是催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不是西方学者“中国威胁论”中所说的霸主地位的转移,而是时代、治理体系、秩序规则和文明的新旧替换,具体而言即全球化时代及其全球治理规则和为规则辩护的全球文化与文明的新旧更迭。几百年来西方资本逻辑霸权主宰的旧全球化时代格局和文明正在被颠覆,中国式现代化主张的多元主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全球化时代的治理体系和文明逻辑正在崛起。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在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视域中,中国式现代化加速发展的全球效应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可以被表述为“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这一标识性话语,这是一种新的“天下观”。

世界变局即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的根本原因是东西方冲突。一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宰制全球的霸权体系即旧全球化时代体系和全球文明对于非西方世界人民和民族国家的长期奴役、剥削和统治是不正义的和灾难性的,它造成了非西方世界广大人民被侵略、被殖民、被剥削和被奴役的苦难经历,几百年来已经激起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不断抗争,推翻这一旧全球化体系的霸权统治

[1]对“相契相成”之道的四个问题的深层次思考需要另篇专论,在此不赘述。

早已成为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民族和国家人民的强烈期盼和一贯主张。西方为了维护这一全球霸权体系,总是在建立西方话语霸权,将“西方-东方”关系、“北方-南方”关系以“文明-野蛮”的逻辑进行辩护。将不公正、不合理、不正当的旧全球化时代充斥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说成天然合理的“自然法则”,因而是公正、合理、正当的文明体系。西方入侵和统治东方,让东方从属于西方,被宣传为让西方的“文明之光”照耀“野蛮的”东方,把东方民族从“野蛮的黑暗”中“解放出来”、加以“文明化”的世界历史性“进步”的“合理行动”。这就是西方编造的充斥着“殖民合理理论”话语编码的所谓“东方学”^[1]。尽管二战之后一大批原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取得了政治独立地位,但是一穷二白的经济文化状况导致其往往依附于原本的“宿主”或霸主,其依然被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控制、在文化和文明上奴役^[2]。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成立新中国实现政治上的独立,改革开放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而且要打破为旧全球化时代秩序辩护的西方霸权的“文明话语”和叙事体系,实现精神上和文化上的自主独立。我们不仅要在全球化实践中与世界人民一道大力开创和加速新全球化时代的变局,更要在深层次的理论和话语创新上为新全球化时代的出场阐明核心要义和必然性。

二是因为中国崛起成为加速推动世界变局的主要力量,走向强盛的中国成为期望变局的发展中国家和民众望所归的领航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正在悄然改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百年间“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正在被“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时代取代。中国式现代化加速发展进程所改变的不仅是中国面貌,而且是全球秩序和文明形态。因此,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要科学揭示这一世界变局的本质,阐明中国崛起进程在深刻改变世界格局的同时必然改变西方式现代化和旧全球化进程造成的全球分裂、对抗和崩溃的局面。

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不仅是一种客观规律性趋势,更是一种轴心文明、文化秩序的大转换。揭示其规律发生的客观必然性和价值指归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化,不仅需要描述性话语,更需要哲学论证。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化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然要求对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作出哲学解答。面对这一大转换的趋势,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以哲学自觉构建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就是要将“问题中的哲学”转化为“哲学中的问题”,并在哲学话语中加以阐释。新时代唯物史观中国逻辑将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的历史必然性转化为一种哲学话语的表达,就是阐明从基于单一资本逻辑主体性的旧全球化体系向多元主体平等交往的新全球化体系转变的必然性及其逻辑指归,进而阐明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必然性、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化。资本逻辑宰制的旧全球化时代,排斥非西方民族国家主体的单一主体性、基于西方中心论的单一“主体-客体”关系、单线论历史观和单一现代化标准论,都是以资本逻辑的单一霸权主体论为特征的。而单一主体论排斥“他者”共在主体和平等交往,必然导致全球治理结构和文明形态的不合理、不正当和不合法。即将到来的新全球化时代推崇多元主体共在,国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以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代替战争和对抗,以合作共赢代替零和博弈,以文明互鉴取代文明霸权,这些都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要义。这一哲学话语构建的前景,呼唤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3]。

〔责任编辑:洪 峰〕

[1]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页。

[2]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齐海燕、毛金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3]任平:《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The Grand Mission of Studying the Chinese Logic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New Era: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System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en Ping

The grand mission of studying the Chinese logic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new era lies in deeply revealing and elucidating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dvanc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rom practical innovation to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system. This mission encompasses the following dimensions: (1) elucidating the "novelty of the path" and "novelty of the essence" through which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ranscends the shortcomings of Western-style modernization; (2) explicating how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unleashes the robust vitalit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its fundamental economic system and humanistic economics, thereby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3) clarifying how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ddresses the realities of a diverse society and guides all people toward the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4) expounding how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ystematically advances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through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Party leadership, the people's mastery of their own affairs, and law-based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5) illustrating how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nurtures the roots of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chieving a civilizational synthesis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6) articulating how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mplements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7) elaborating the global civilizational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logic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new era,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hinese discourse, Chinese narrative system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from "Benevolence as the Unity of All Things" to the Idea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hen Jihong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ot only shares an intrinsic compatibility with the Confucian idea of "benevolence as the unity of all things" but also achieves a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tter based on the standpoint and methodology of Marxism. Taking the discourse cluster guided by the idea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an analytical sample, this study deeply examine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enevolence as the unity of all things" concept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In terms of ontological implications, the notion of "you are within me, and I am within you" aligns both formally and substantively with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xiang ren ou*" (mutual human connection), while explicating the basis of humanity's collective interconnected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is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abstract Confucian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hat underpins "*xiang ren ou*", thereby endowing the core mean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ith robust explanatory power grounded in reality. Regarding ethical implications, from a Marxist standpoint, the notion of "one family under heaven" transforms the universal love heralded by traditional discourse into a universal ethical obligation within modern political practice. Meanwhile, the discourse of "the people" aligns with the people-centered connotation of "benevolence as the unity of all things" while surpassing its limitations, thus illuminating the ethical essenc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erms of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the mod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iscourse embedded in the idea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guided by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creatively transforms the life-interconnectedness, "love for all things", and hierarchical logic inherent in "benevolence as the unity of all things". This broadens the significance, ethical essence, and value objectives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a theoretical outcome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the idea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ffectively refutes the misinterpretations of the way and essence of human existence by Western-centrism.

Keyword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enevolence as the unity of all things, creative